

引用格式：

王志涛, 李晗冰, 李增福, 游正宇. 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机理和实现路径：“寿光模式”的纵向案例研究[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5, 46(1): 92-102.

WANG Z T, LI H B, LI Z F, YOU Z Y. Mechanism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agriculture: a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based on Shouguang model[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5, 46(1): 92-102.

DOI: 10.13872/j.1000-0275.2024.1390

CSTR: 32240.14.1000.0275.2024.1390



# 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机理和实现路径：“寿光模式”的纵向案例研究

王志涛<sup>1</sup>, 李晗冰<sup>1\*</sup>, 李增福<sup>2</sup>, 游正宇<sup>3</sup>

(1. 广州理工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广东广州 510540; 2.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6;  
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北京 102488)

**摘要：**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进程，已经引起学术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基于注意力基础观、制度逻辑和资源编排理论整合的视角，采用纵向案例研究的方法，探讨了寿光市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催生和发展历程，这一发展模式被称为“寿光模式”。研究表明：1) 一个地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有效路径是主导产业的培育、绿色发展、平台创建，直至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2) 在各个发展阶段中，注意力的配置和聚焦方向始终贯穿着对技术要素和增收致富的诉求，制度逻辑形成了对发展的认同，资源编排形成了资源的转化能力；3)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是人才、土地、科技、资本和数据等资源要素创新组合的过程，突破了传统农业的边界。研究过程揭示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内在机理，推进了资源编排理论的深化，研究结论为各地区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农业新质生产力；注意力基础观；制度逻辑；资源编排；寿光模式

中图分类号：F3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275 (2025) 01-0092-11

## Mechanism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agriculture: a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based on Shouguang model

WANG Zhitao<sup>1</sup>, LI Hanbing<sup>1</sup>, LI Zengfu<sup>2</sup>, YOU Zhengyu<sup>3</sup>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Guangzhou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40,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China; 3.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and the advancement of Chinese-styl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have gained widespread attention in both academia and industry. Based on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of the attention-based view, institutional logic, and resource orchestration, this paper adopts a longitudinal single-case study approach to explore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in Shouguang. This development model is referred to as the Shouguang Model. The study finds that: First, an effective path for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at the regional level involves cultivating a dominant industry, promoting green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ing platforms until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formed. Second, throughout various stages of development, the allocation and focus of attention consistently address the demands for technological elements and income generation. Institutional logic fosters alignment with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 orchestration facilita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s. Thir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is an innovative combination of resource elements such as talent, land, technology, capital, and data, breaking through the boundaries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This paper reveals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behind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and contributes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收稿日期 Received: 2024-08-30; 接受日期 Accepted: 2024-12-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9ZDA04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24YJA790071)；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GD23XYJ54)；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科技项目 (SGHEDK00KJJS2310138)。Supported by the Major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oundation of China (19ZDA048); Planning Fund Projec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4YJA790071); Planning Projec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GD23XYJ54);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of State Grid Corporation of China (SGHEDK00KJJS2310138).

\* 通信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 (kloseli@vip.163.com)

resource orchestration theory. The conclusions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in different regions.

**Keywords :**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agriculture; attention-based view; institutional logic; resource orchestration; Shouguang model

创新驱动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培育科技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并实现成果转化,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支撑。作为新时代背景下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共同推动,其本质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及其组合的质变,其重要表征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源泉。同样,在实现乡村振兴和建设农业强国的过程中,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形成,这带来了生产效率提升、品牌培育、产业竞争优势和农业创新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的协同效应,为农业强国建设提供了坚实基础。

当前,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从多个角度展开。已有研究聚焦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深入探讨了其形成的驱动因素及作用机制。例如,有学者指出,新质生产力对国家粮食安全及相关产业链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sup>[1-3]</sup>;另一些研究强调,数字化和智能化驱动的精准农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现形式,其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能够促进农村产业结构优化、三产融合及新业态的不断涌现<sup>[4-7]</sup>。此外,产业融合的研究表明,其不仅推动了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还显著提升了农民收入<sup>[8-9]</sup>。总体来看,这些研究揭示了新质生产力对科技创新、要素配置、产业转型升级及生态价值提升的推动作用。然而,相关研究也指出,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虽然在生产效率、科技创新及生态价值方面表现良好,但在区域间依然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性<sup>[10]</sup>。尽管如此,目前的研究更多聚焦于理论溯源或相关关系的验证性分析,对于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快速形成的动态演化过程及其纵深发展机制,研究尚显不足。一方面,微观层面的农业技术创新、技术扩散及要素配置等实践活动尚缺乏系统的理论化分析<sup>[11]</sup>;另一方面,宏观层面的产业升级、产业集聚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过程,也尚未形成清晰的理论框架和机理解析。这些不足表明,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纵向演化规律与路径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基于上述研究进展与不足,本文针对“农业新质生产力”,将农业领域科技创新资源整合、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及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等要素形成的新质生产力视为研究对象。本文以组织管理理论为基础,借助注意力基础观、制度逻辑和资源编排等理论工具,分析社会行为、市场行为和政府行为的作用机制,并围绕“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机理与实现路径”这一命题,通过典型案例剖析其演化过程,重点分析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阶段性特征、科技创新突破及生产要素配置的具体体现,以及其纵向演化机理和实现路径。本文旨在深化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认识,为各地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本土化实践的理论支撑和参考价值。

## 1 理论分析框架

### 1.1 农业发展中的制度逻辑与注意力配置机制

制度逻辑是社会层面已形成的共享认知模式,影响参与主体在特定情境中的行为规则与价值观<sup>[12-13]</sup>。在这一框架下,各主体将注意力集中于特定问题集合,并制定相应决策方案。然而,制度逻辑并非静态不变,其转变源于情境变化、制度改革及认知模式调整。这种演化会引发注意力与决策的转向,进而推动战略发展方向及农业结构的重大变革。例如,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农业农村科技创新政策,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自上而下的政策落实体现了政府逻辑,但地方政府亦结合区域特点对政策内容进行再生产与创新,以实现更高效的资源配置和发展目标<sup>[14]</sup>。

农村农业领域的制度逻辑具有多样性,不仅涵盖政府逻辑与市场逻辑,还涉及家庭、村庄、合作社、企业及村集体等多重制度逻辑。多重制度逻辑的互动与协同演化能催生制度变革。例如,农村数字平台商业模式创新,即是在多重制度逻辑背景下的制度融合过程<sup>[15]</sup>,从而推动了农业的数字化转型。与此同时,注意力基础观也被广泛运用于分析主体的注意力配置及其对决策行为的影响<sup>[16]</sup>。注意力的稳定性、动态性与一致性(即“注意力三角”)能够塑造不同的决策路径。注意力基础观与制度逻辑紧密相关,后者通过影响主体的认知与行为选择,成为注意力配置的重要决定因素<sup>[17-18]</sup>。在农业政策

变迁中，本质上是多重制度逻辑建构下，各参与者通过注意力配置进行决策的过程<sup>[19]</sup>。因此，单一视角难以完整刻画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机理。需要整合注意力基础观与制度逻辑，构建统一的理论框架，以揭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特殊形成路径与动态演化过程。

## 1.2 资源编排：制度逻辑与注意力基础观的理论整合

资源编排理论在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在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过程中。其核心在于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具体包括资源结构化、捆绑和撬动的联动过程。单纯拥有资源并不足够，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合理的管理和有效地运用实现资源的最大价值。资源编排理论揭示了企业竞争优势形成的“黑箱”<sup>[20]</sup>，即合理的资源编排既是能力的形成过程，也是竞争优势的来源。由于其强大的解释力，资源编排理论在农业科技创新治理中同样得到了广泛应用。研究表明，资源编排在农业科技创新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sup>[21]</sup>。

从管理流程的角度看，资源编排促使管理者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灵活调整资源组合。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管理的适应性，还验证了资源编排作为提升创新资源投入产出效率的核心驱动力的价值<sup>[22]</sup>。因此，农业科技创新领域中的有效资源编排机制对于创新活动的成功至关重要。此外，资源编排也阐明了资源整合如何转化为实际能力这一动态机制。资源编排不仅是资源配置优化的过程，更是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及成果产出的根本源泉<sup>[23]</sup>。这一过程直接决定了农业科技进步的实际效果，强调了资源编排在推动农业科技发展和增强创新能力方面的关键作用。

当农业区面临显著挑战，未能充分激发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时，资源编排仍能提供有力的解释。从管理职能角度来看，资源编排要求管理者灵活调整资源配置，以应对内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这一过程不仅关注资源的数量变化，更注重通过资源优

化配置与高效利用，提升组织能力并明确资源与能力之间的内在关系<sup>[24]</sup>。因此，资源编排在农业科技创新治理中既能提供理论支撑，也能为地方政府的创新治理提供应用价值。同时，资源编排理论在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案例研究中具有广泛应用，如数字化创新、绿色创新、科技创新、技术平台建设以及新产品开发等<sup>[25-27]</sup>。

在此基础上，资源编排理论与注意力基础观和制度逻辑理论的有机整合具有重要意义。各决策者在进行资源编排时，其主要目标是通过“资源结构化→资源捆绑→资源撬动”三个环节合理配置资源，并在此过程中形成注意力三角（稳定性、动态性和一致性）。此外，决策者对政府政策、市场认知和产业发展经验的丰富性，能够帮助其更好地把握制度逻辑的形成规律，识别资源的潜在价值，从而提升资源编排的创造力<sup>[28]</sup>，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明确的发展目标（如绿色转型、数字农业、农业科技创新等）不仅能够集中决策者的注意力，突破制度逻辑的惯性，还能提高资源编排的效率，从而为揭示注意力、制度逻辑到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内在机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尽管上述理论融合的趋势已逐渐形成<sup>[15, 18]</sup>，但现有文献中尚未将这种理论融合应用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为此，本文选取“寿光模式”这一农业新质生产力快速形成的成功典范，结合注意力基础观、制度逻辑和资源编排理论，分析该模式的内在过程和作用机制。图 1 展示了本文分析框架，揭示了这些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

## 2 研究方法

### 2.1 研究对象和研究设计

本文选择“寿光模式”作为研究案例，基于其在农业科技创新和资源配置方面的典型性、适配性、资料可得性以及广泛的普适性。寿光市通过将农业科技创新与资源配置高度融合，推动了蔬菜产业的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与品牌化，成功成为全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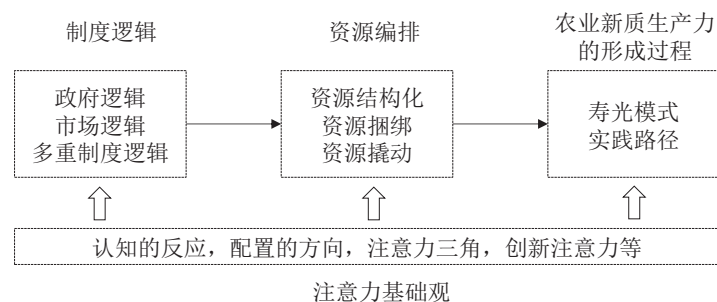


图 1 理论分析框架

Fig. 1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蔬菜生产的领军者，展示出强大的示范效应。寿光市的前瞻性注意力配置和清晰的发展脉络，有助于构建“寿光模式”内在的核心解释机制，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对接。

本文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对“寿光模式”进行深入分析，具体原因如下：首先，模式的形成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具有过程性和机理性特征。其次，单案例研究有助于讲述“寿光模式”形成与发展的故事，借助丰富的资料支持，对其中蕴含的理论逻辑进行系统化、概念化的分析，确保研究的深度与高度相匹配，增强研究的可信性。此外，农业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概念，尚未得到充分探讨，本文通过整合注意力基础观、制度逻辑和资源编排等理论框架，旨在揭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及其驱动机制。最后，研究模式的形成适宜采用纵向的时序分析和关键事件观察方法，回溯关键里程碑事件，既有助于划定时序区间，也能深入探索理论框架与农业新质生产力实际形成过程的关系。

## 2.2 数据资料收集及分析

本文所需的研究资料来源于多个渠道，包括研究团队于2024年1月进行的实地考察、结构化和非结构化访谈、文献资料，以及通过互联网收集的大量二手资料。结构化和非结构化访谈的对象选择侧重于研究对象的代表性和相关性。二手资料的收集采用爬虫软件，关键词包括“寿光模式”“蔬菜之乡”“寿光产业（集群）”“寿光农业”“寿光科技创新”“寿光合作社”“寿光品牌”等。所有一手和二手资料经过充分整理、阅读和分类，确保信息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多渠道的资料来源为三角验证提

供了坚实基础，研究者、被研究者及外部视角（如文献和媒体资料）的相互印证，有助于消除认知偏差，提高研究结论的信度与效度。

本案例研究的资料分析过程如下：首先，对一手和二手资料进行整合和归类，识别“寿光模式”的初始关键事件，进而构建模式的纵向时间轴。根据时间轴的不同阶段，匹配相关资料并分析其中的关键时间节点及其理论关联（即注意力基础观、制度逻辑和资源编排）。第二步，在各时间区间的资料基础上，采用多层次的手工编码及质性分析软件编码。一级编码（初始或开放式编码）形成初步的构念和范畴；二级编码（主轴编码）探讨一级编码中初步范畴之间的关系，合并共同特征形成主范畴和聚合构念。在此基础上，将这些主范畴融入案例情境，通过理论视角（如注意力基础观、制度逻辑和资源编排）挖掘背后的逻辑线索，最终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及“寿光模式”形成机理和实际路径的“故事线”<sup>[29-30]</sup>。第三步，所有研究人员共同参与编码工作，独立拟定编码方案，完成每一阶段的编码后，通过集体讨论达成对构念和核心概念的统一定义与命名。过程中，还引入外部专家学者对三个级别的编码和论证进行评估，确保分析的准确性和严谨性。

根据收集到的关键事件、时间节点和证据链条，本文将“寿光模式”的形成与演化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蔬菜产业逐步成为支柱产业”“绿色转型”“创新平台的培育”和“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如图2所示。本文对每个阶段的关键事件、注意力聚焦、制度逻辑、资源编排、能力形成和模式演进特征进行了归纳，总结出“三次重大转型”：即“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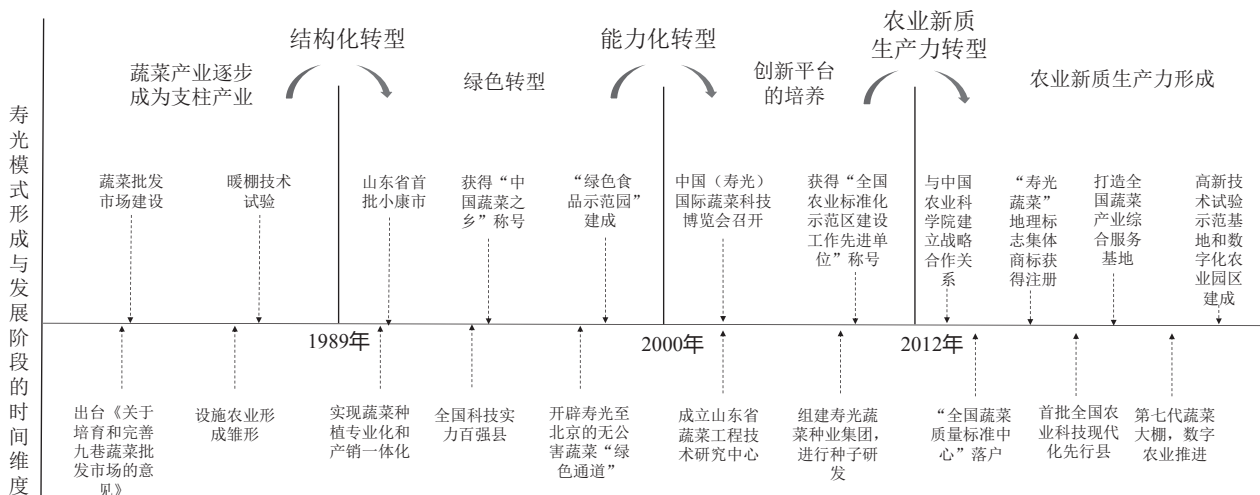


图2 “寿光模式”发展路径、关键事件和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示意图

Fig. 2 Diagram of the development path, key events,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the “Shouguang model”

构化转型”“能力化转型”和“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这三次转型不仅是每个阶段过渡至下一个阶段的战略更新，也是刻画“寿光模式”演进及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证据，生动体现了其发展历程。

### 3 结果与分析

基于注意力基础观、制度逻辑和资源编排等理论，本文通过“寿光模式”在我国本土情景下的演化过程的分析，得到其形成原因和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路径。寿光模式的每个发展阶段都伴随创新和产业升级，二者相互促进，形成了共演共进的关系。

#### 3.1 以蔬菜为主导的产业集群形成：制度逻辑下的资源编排探索

3.1.1 政府逻辑主导下市场逻辑的紧密配合 寿光日照资源丰富、蔬菜种植历史悠久，但早期大棚保温性能不足，导致蔬菜上市时间延迟。这不仅增加了生产成本，还使农民的收益较低。因此，调整土地种植结构显得尤为重要。在农业发展过程中，通过实地考察与学习，调整了不适宜粮食作物的土地转为果树栽培，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成为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政府意识到，单一的产业发展并非唯一的脱贫路径。一方面，特色水果产业的优势较弱，且产品附加值较低；另一方面，单一依赖粮食和林果业不足以支撑经济发展。经过充分调研，决定采用冬暖式大棚技术，种植季节性和反季节蔬菜。在专家指导下，率先建设冬暖蔬菜大棚，成功实现蔬菜反季节上市。冬暖蔬菜大棚的引入极大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益，成为高产高效农业与绿色革命的典范。

这表明在“寿光模式”发展的初期阶段，政府逻辑在制度逻辑中占据主导地位，市场逻辑紧随其后。在中央农业政策引领下，地方政府结合本地资源优势，制定适宜的农业政策，推动生产、市场开发与农民致富相结合。政府和市场逻辑的紧密配合，结合基层实践，突破了传统思维模式，推动了以蔬菜产业为主导的强县富民发展模式逐步形成。

3.1.2 内源式资源建构下的注意力配置 在寿光农业发展的某一阶段，资源编排主要围绕内源性资源的利用与整合展开，深植于本土农业实践土壤中。通过“内源式资源建构”策略，激活了长期积累的自然资源、农业知识、地方智慧和社区力量，加速了资源构建，并适时引入创新资源。政府实施的相关政策，不仅尊重传统，还融入创新元素，促进了蔬

菜产业向大棚聚集，推动集约化和规模化生产，成功突破了传统农业产业的界限，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使蔬菜产业成为主导产业。这一过程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和行动合力，显著提升了社会动员能力。

在此基础上，寿光通过“探索式资源建构”增强了市场洞察和培育能力以及资源建构主体的学习能力。通过建立完善的蔬菜批发市场体系和相关管理机制，逐步发展成为全国蔬菜批发的中心节点。同时，在产业崛起过程中运用了“要素整合式资源建构”策略，优化了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配置，实现资源高效利用，提升了农民收入。虽然这一阶段尚未引发农业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或产业深度转型，但它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萌芽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萌芽期，政府与市场逻辑紧密协同，共同推动了寿光蔬菜产业的快速发展。内源式资源建构通过深挖本土资源潜力，并与现代科技和管理理念相结合，加速了资源向资产的转化，注重提升劳动者技能和素质，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了关键要素。探索式资源建构则通过捕捉市场机遇，创新资源组合方式，提高了市场响应速度。要素整合式资源建构通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特别是引入现代农业技术设备，提高了生产效率与资源利用效率，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融合与升级奠定了基础。这一系列资源建构策略不仅体现了寿光农业转型升级的核心价值，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 3.2 绿色转型：以资源捆绑推动产业深度转型

3.2.1 市场逻辑与政府逻辑齐头并进 在蔬菜产业崛起并成为主导经济支柱的背景下，当地政府于1990年正式启动了全县蔬菜大棚种植“绿色战略”计划。此战略通过蔬菜批发市场的建立，成功将地方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经济优势，展现了流通环节对生产促进的深远意义。随着蔬菜及其加工产品成为当地出口创汇的重要支柱，政府深刻认识到，蔬菜产业规模化和品质化后，科技赋能、龙头企业带动基地、基地与农户紧密联结的重要性。为此，当地相继建立了多个蔬菜加工厂和冷藏设施，带动了180多个专业村落和3000多户农户的发展，培训了4万余名专业技术人员，基本实现了农业、工业、商业的一体化发展。1995年，随着种植面积持续扩大，提出了优化种植结构，广泛推广新品种和新技术，以实现科技密集型应用的目标。十万亩（约6700 hm<sup>2</sup>）高效农业示范工程被纳入国家重点科技开发项目。同时，专业化生产、社会化服务及产销

一体化水平得到快速发展。

以上分析表明，在绿色转型阶段，市场逻辑开始导入，并对政府逻辑施加显著影响。在这一阶段，市场逻辑与政府逻辑齐头并进。随着新的制度逻辑形成，对原有制度逻辑产生了影响和冲击，新的制度逻辑修缮甚至取代了原有的制度逻辑。例如，当社会对蔬菜的需求发生显著变化时，及时调整注意力配置，确保市场逻辑与政府逻辑的共同联动，成为重中之重，这在相当程度上保障了“市场-机会-资源”的良性互动。

**3.2.2 资源捆绑下的绿色转型** 在绿色转型阶段，存在着三次显著的跃升，每次跃升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与内涵。首次跃升为“传统绿色转型”，标志着设施农业的广泛实施，促使蔬菜产量、栽培技术、作物结构、蔬菜品质及经济效益等多方面的改造与升级。第二次跃升为“结构性绿色转型”。在此阶段，基于市场需求与产业化趋势，调整了产业结构，化解了传统蔬菜产能过剩问题，并积极培育无公害绿色蔬菜，将绿色工艺与技术深度融入产业发展。第三次跃升为“多要素协同绿色转型”。该阶段通过科技进步与产业变革，重新组合并迭代升级了生产要素，显著提升了劳动、土地、资本及技术等全要素生产率。

在这三次跃升过程中，根据内外部资源状况，实现了三种资源捆绑模式。1)“维持式资源捆绑”模式。该模式与设施农业的全面推广紧密相关。通过整合内外部资源，密切关注市场需求，维持并强化了设施农业生产格局及蔬菜产业的示范带动作用，持续推动规模化与科学化种植。随着全国最大蔬菜集散地的建成，进一步聚焦蔬菜种植核心板块，通过政策与资金的及时跟进，形成了大棚种植设备的高端化、技术标准化及产品品牌化，显著提升了设施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并实现了技术、产品与人才的全国输出。2)“扩展式资源捆绑”模式。在此阶段，改变了资源配置方式，以保持并扩展市场竞争优势及可持续发展能力。随着冬暖式大棚技术的全国推广，反季节蔬菜成为普遍现象，“种植模式”也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复制。当地认识到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在于蔬菜质量与品质，及时出台了绿色食品生产技术规程，建设质量检测中心，并重视农业龙头企业的培育与创新支持，为生产标准化、品牌建设、技术创新及中小企业带动等方面奠定了基础。3)“创新型资源整合策略”模式。该模式不断探索并整合新的生产要素，加速技术革新步伐。尽管设施农业与绿色化进程已带动相关产

业兴起并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但现代农业技术与蔬菜产业的深度融合仍需加速。为此，开展了绿色证书培训、农民技术员职称评定等活动，促进科技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并高度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引进新技术。这些创新性资源整合策略为蔬菜产业集群的形成及全产业链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寿光模式”的绿色转型阶段在农业科技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及农业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通过农业科技水平的提升与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与迭代升级，显著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现阶段，更高素质的劳动者成为推动绿色转型的关键力量，通过加强农业教育与培训提升了专业技能与科学素养；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的应用成为转型升级的重要标志；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的开发利用则为绿色转型开辟了新空间。这些变化共同促进了“寿光模式”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深度升级。

### 3.3 创新平台培育：以“输出”集聚农业生产力要素

寿光市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重点发展无土栽培技术，并通过成立合作社促进资源共享与技术交流。这一技术成为农民增收的关键路径，并推动了农业国际化进程。在此过程中，寿光市加强了加工出口、海外研发、人才培养和全球销售，同时建立了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确保了产品质量与标准化生产。

为了发挥资源集聚优势，寿光市致力于打造“寿光模式”创新平台。通过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建立了蔬菜科技攻关与产学研创新体系，推动了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建设。农产品物流园成为全国蔬菜集散、物流、标准和价格形成的中心，而设施蔬菜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则为蔬菜产业的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寿光市的创新平台培育包括了对传统产业的提质改造、内外技术创新源的获取以及农民与市场、新技术的桥梁建设。这些措施形成了资源编排的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能力，为未来的资源撬动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过程中，寿光模式通过制定蔬菜产品标准、扩展产业链条、构建现代化蔬菜产业体系，并输出创新平台，推动了农业生产力要素的质变。通过高素质劳动者、智能农机等高新技术劳动资料，以及数字资源等广泛劳动对象的应用，寿光市成功推动了传统生产力要素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深度融合，拓展了蔬菜生产的边界，推动了绿色转型的高质量发展。

### 3.4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以资源撬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3.4.1 制度逻辑下的资源要素重组 这一阶段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的关键时期。寿光市在此阶段明确提出了新型工业化、农业高端化等发展战略，强调科技进步与创新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中的核心作用，致力于发展现代、高效、生态和数字农业。本阶段的制度逻辑基于前期形成的创新平台，旨在实现高水平技术创新、汇聚高质量创新要素，并推动蔬菜产业的深度变革。

“寿光模式”中的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阶段，恰是蔬菜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时期。制度逻辑的核心特征在于引导人才、土地、科技、资本和数据等资源要素及其创新组合向产业集群汇聚，强调产业链的有序延伸。在这一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生产能力的集成化、蔬菜产品的高端化以及经营方式的组织化，有力推动了“寿光模式”中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步伐。这一过程使农户成为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共享蔬菜产业提质升级的红利，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由此可见，“生产性努力”（即提升生产力水平）的制度安排，能够促使多重制度逻辑形成共识，并在实践中协同作用。寿光政府的逻辑主要体现在引领、治理、政策保障和整体统筹，且与市场逻辑高度契合，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政府逻辑和市场逻辑之间的二元对立。

3.4.2 以资源撬动加快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 在本阶段，寿光市的资源编排策略集中体现在三种资源撬动模式上，即协调式、部署式和集成式，这些模式共同推动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

首先，协调式资源撬动通过整合生产与创新要素，构建了以蔬菜产业为核心的农业新质生产力体系。寿光市利用数字要素驱动全产业链生产要素的汇聚与协同，前端加强种子研发与技术集成，形成多元创新要素的协同攻关机制，确保科技创新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同时，通过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共生体的形成，构建以龙头企业、产业园区为主体的农业经营体系，提升农户与合作社的管理水平，实现生产的标准化与集约化，进而促进产业增效与农民增收。此外，后端通过品牌、市场与物流的“倒逼”机制，推动全产业链的技术创新与闭合运行，加速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其次，部署式资源撬动体现在寿光市对关键工作的前瞻规划与部署上。早在2010年，寿光市即开始自主种子研发，现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种苗繁育基地，并形成了完整的种子产业链条。同时，通过

建立“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推动我国蔬菜全产业链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实现了生产的标准化与数字化，显著提升了蔬菜的品质与品牌影响力。

最后，集成式资源撬动则通过新技术、设备等的集成推广，加速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寿光市的“现代农业高新技术试验示范基地”作为重要平台，集成了多种先进技术，前端重点进行标准制定、种子研发与技术集成创新。通过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及园区化发展，提升了产业链中端与后端的集成能力，加快了由输出标准向输出集成解决方案的转变，为全国多地提供了全产业链的问题解决方案。

综上所述，寿光市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阶段，通过农业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以及农业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增长与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寿光市不断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入新技术、新装备和新模式，全方位提升了劳动、技术、数据和资本等农业要素的水平。同时，通过加强农民教育培训、引进高端农业人才等措施，培养了一支具备现代农业知识、技能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劳动者队伍。此外，寿光市还积极拓展农业生产的边界和增值空间，将劳动对象从实体产品扩展到服务、文化和品牌等非物质领域，极大地丰富了农业的内涵与外延。因此，本阶段寿光市完成了由“技术为王”向“农业新质生产力领航”的重大转变，展现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全面发展的显著特征。表1给出了上述四个阶段的编码、主要构念和典型证据例证。

### 3.5 寿光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模型与路径构建

根据上述基于注意力基础观、制度逻辑和资源编排为理论基础的案例分析，通过重要的时间节点划分的四个阶段，深入剖析了代表农业新质生产力快速形成的“寿光模式”的演化过程。这一演化过程以“注意力”贯穿始终，形成过程沿着“制度逻辑推动→资源编排策略→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路径，构建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模型，如图3所示。

具体而言，理论模型围绕制度逻辑、资源编排活动及能力输出方式三个核心维度，深入探讨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构建与演进机制。在制度逻辑维度，随着蔬菜产业的扩张，政府逻辑与传统生产力要素的融合，驱动了资源建构活动。该融合包括内源式、探索式及整合式的资源建构方式，进而促进了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在资源编排活动方面，模型突出绿色转型与创新平台培育两条路径。政府与市场逻辑协同作用，通过资源捆绑与结构化转变，推动了

表 1 “寿光模式”各阶段的构念识别、编码和典型证据例证

Table 1 Construction identification, coding, and typical evidence examples of each stage of the “Shouguang mode”

维度	二阶主题	一阶概念	典型证据举例
制度逻辑	政府逻辑	—	1. 冬暖式大棚试种成功后，县委县政府通过广泛宣传，增强了菜农对反季节蔬菜的信心，促进了其经济收益认知； 2. 蔬菜办公室协助建设冬暖式大棚，提供基础设施支持，助力反季节蔬菜生产； 3. 政府通过调研提出以全产业链提升蔬菜品质为核心的发展策略，优化“寿光模式”发展方向。
	市场逻辑	—	1. 寿光市与中国农科院建立院地合作，推动研发与成果转化； 2. 构建研发、成果转化与市场化运营综合平台； 3. 完整的成果转化链条涵盖新技术、新品种、新技能及创新模式。
资源编排过程	资源结构化	内源式	1. 由于土地资源有限，设施农业成为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效率的必由之路； 2. 种植应依据区域资源优势，科学选择作物品种； 3. 强调市场导向，确保种植的产品可有效销售，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探索式	1. 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本质上是对作物品种的优化与配置； 2. 建立交易市场是促进蔬菜顺畅流通的关键举措； 3. 成立寿光本土蔬菜批发市场，增强地方蔬菜产业竞争力。
		要素整合式	1. 通过地块调换，将优质地块分配给大棚户，促进集中高效建设； 2. 重点发展专业户和重点户，培育具有特色的大规模农户。
	资源捆绑	维持式	1. 推广高产高效蔬菜种植经验和做法，并采取开放态度，向全国分享相关模式； 2. 寿光蔬菜产业规模迅速扩张，逐步成为全国蔬菜集散地，对市场产生重要影响。
		扩展式	1. 制定《绿色食品蔬菜生产技术规程》，为蔬菜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2. 建立农副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强化质量安全监管； 3. 吸引国外公司在寿光建立育种研发基地。
		开拓式	1. 开展绿色证书培训和农民技术员职称评定，提升农民科技素养与专业技能； 2. 校地联合科技攻关，推动优良品质技术与生物技术在蔬菜育种中的应用； 3. 举办首届中国寿光蔬菜博览会，为产业推广提供平台。
	平台构建	创新平台打造	1. 设立多个国家级蔬菜种业、研发及质量标准中心，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支撑； 2. 建立公益性服务平台，提供全方位的产业支持。
	资源撬动	协调式	1. 合作社通过注册商标，推动从分散种植到集约化发展的转变； 2. 统一品种和渠道，形成品牌效应，推动产业化进程； 3. 融合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推动智慧农业发展； 4. 通过多业态融合，打造全产业链智慧农业模式，提升农业智能化与效率化。
		部署式	1. 聚焦标准和种子研发，为产业基础奠定基础； 2. 构建以合作社、家庭农场为主体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优化资源配置； 3. 重点培育高端蔬菜品牌，拓宽销售渠道，提升产品价值。
		集成式	1. 蔬菜质量标准中心集成了 2 000 多条产业链标准，建立了近 200 个蔬菜标准数据库； 2. 通过集成新技术、新设备、新模式，推动农业现代化，提高生产效率。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技术革命	蔬菜种植技术的革命	蔬菜产业通过绿色生产技术实现了绿色种植，推动可持续农业发展。
	要素整合	输出产品、人才与技术	1. 蔬菜销往全国 30 多个省份，并进入大城市高端销售平台，展示市场竞争力； 2. 项目涵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科技创新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的科研人员与技术人员。
	科技创新	输出标准、输出体系、输出平台	1. 逐步形成并推广认可的行业标准，提升蔬菜产业整体水平； 2. 提供全套蔬菜种植标准和技术支持，满足多样化需求。
	产业深度升级	集成应用生态系统	1. 通过蔬菜博览会展示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模式，促进行业交流； 2. 在标准制定、种子研发和技术集成创新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支持蔬菜产业发展； 3. 建设现代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高端品质蔬菜生产区等，构建完整产业链生态圈，实现全链条协同与升级。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初步形成；随后，市场与政府逻辑交织，通过能力转化与多阶段资源编排活动，逐步构建了具有影响力的创新平台，加速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能力输出方式上，模型强调以多重制度逻辑为核心，运用协调式、部署式和集成式资源撬动策略，确保资源的高效整合与优化配置，促进现代农业高新技术的集成应用，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综上所述，寿光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机理可以概括为：在持续的聚焦下，通过制度逻辑的推动、资源编排策略的实施以及能力输出方式的优化，最终实现了农业生产力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首先，政府逻辑与生产力要素的融合，激发了资源构建活力，推动了技术革新与产业升级。其次，采取绿色转型与创新平台培育路径，通过资源捆绑与结构化转变，以及能力转化与资源编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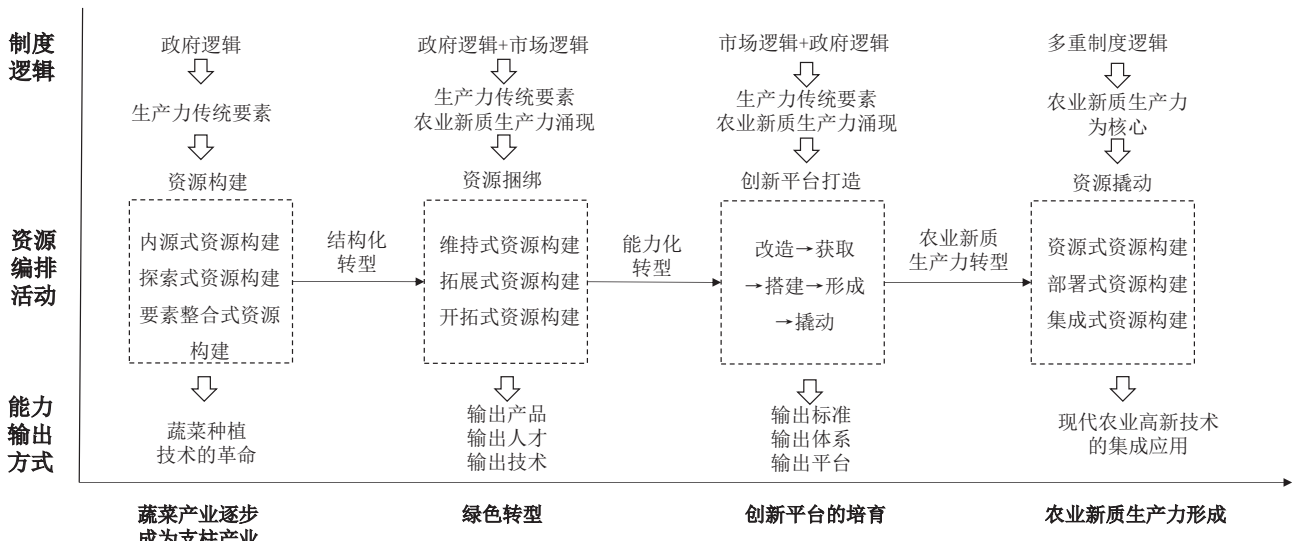


图 3 寿光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模型

Fig. 3 Theoretical model for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Shouguang

多阶段活动,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支撑。最后,通过协调式、部署式与集成式资源撬动策略的实施,促进了高新技术的集成应用,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了农业从“技术驱动”到“新质生产力领航”的转变,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 4.1 结论

1)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路径涵盖主导产业培育、绿色发展、平台创建至新质生产力形成四阶段,贯穿技术要素与增收致富诉求,伴随技术创新、生产要素升级等动态演化。

2) 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可概括为结构化转型、能力化转型及新质生产力形成,其关键在于注意力配置、制度逻辑与资源编排。

3) 各阶段资源编排活动各异,通过实施从内源式深度挖掘到探索式引入外部资源,再到整合式系统优化,最终达成集成式高效捆绑的多样化资源编排策略,有力地推动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逐步孕育、加速发展直至全面形成,实现了农业生产力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目标。

### 4.2 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主导产业、绿色发展和平台建设的政策支持。首先,政府应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农业科研机构与高校开展核心技术研发,特别是在种业、智能农机、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通过税收减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激励技术创新。其次,建立全面的农业

科技推广体系,利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确保最新农业科技成果能够迅速传递给农民。同时,设立农业科技服务站,为农民提供技术咨询和个性化服务,帮助他们掌握和应用新技术。再次,政府应规划并建设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吸引农业企业入驻,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同时,建立农业科技创新孵化平台,为初创企业提供资金、技术、市场等全方位支持。最后,推动农产品电商平台的建设,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第二,优化注意力配置,明确发展目标。首先,政府应制定详细的农业发展规划,明确各阶段的发展目标,如提升农业科技水平、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质量等。通过政策引导,将社会和政府的注意力聚焦到农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重点任务上。其次,引导社会资本和公共资源向关键领域集中,通过设立政府引导基金、PPP项目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农业的关键领域。同时,整合政府各部门的资源,形成合力,确保资源向农业的重点任务倾斜。再次,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土地流转机制,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推进农业金融服务创新,解决农业融资难的问题。加强农业知识产权保护,为农业科技创新提供制度保障,激发创新活力。最后,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和转化机制。通过建立农业资源数据库,实现资源信息的共享。建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第三,实施差异化资源编排策略。在产业培育的初期阶段,政府应提供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支持政策,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同时,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为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进入产业集聚阶段后，政府应重点优化资源的捆绑方式，促进资源的高效整合。通过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建立产业联盟等方式，加强企业间的合作与交流，实现资源的共享和优势互补。同时，应建立产业发展的定期评估机制，对产业的发展阶段和资源需求变化进行动态监测。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政策策略，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和适应性。

第四，广泛推广先进模式，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首先，对“寿光模式”等先进模式进行深入研究和总结提炼，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通过召开现场会、举办培训班等方式，将这些先进模式推广到其他地区。其次，制定针对性政策，引导人才、土地、科技、资本和数据等要素向优势产业集群集聚。

#### 参考文献：

- [1] 侯冠宇, 张震宇, 董劭伟. 新质生产力赋能东北农业高质量发展: 理论逻辑、关键问题与现实路径 [J]. 湖南社会科学, 2024(1): 69-76.  
HOU G Y, ZHANG Z Y, DONG S W. Empower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northeast China with new productive forces: theoretical logic, key issues, and practical paths[J]. Social Sciences in Hunan, 2024(1): 69-76.
- [2] 赵敏娟, 杜瑞瑞. 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全产业链绿色转型: 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 [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4, 45(5): 723-732.  
ZHAO M J, DU R R.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promot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s: the theoretical logics and the empirical path choice[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4, 45(5): 723-732.
- [3] 郝晓燕, 韩一军. 新质生产力赋能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重点任务与实践路径 [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4, 45(5): 743-752.  
HAO X Y, HAN Y J.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nable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grain industry: internal logic, key tasks, and practice path[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4, 45(5): 743-752.
- [4] 王琴梅, 杨军鸽. 数字新质生产力与我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研究 [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2(6): 61-72.  
WANG Q M, YANG J G. Research on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griculture[J]. 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3, 52(6): 61-72.
- [5] 倪坤晓. 新质生产力推动农村改革: 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4, 45(5): 773-781.  
NI K X. Promoting rural reform through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ternal logic, realistic dilemmas, and practical paths[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4, 45(5): 773-781.
- [6] 解胜利, 吴理财. 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有为政府: 基于C县草莓产业发展的长时段考察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1(6): 72-81.  
XIE S L, WU L C. The role of a capable and committed govern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a long-term investigativ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rawberry industry in C county[J]. Journal of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4, 41(6): 72-81.
- [7] 田野, 刘勤, 黄进.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 基于湖北省秭归县三个典型乡镇的案例研究 [J]. 农业经济问题, 2023, 44(12): 36-46.  
TIAN Y, LIU Q, HUANG J. The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enabling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case analysis of three typical towns in Zigui County, Hubei Province[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3, 44(12): 36-46.
- [8] 肖华堂. 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 影响效应、现实挑战与应对策略 [J]. 农村经济, 2024(10): 24-32.  
XIAO H T.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agriculture: influence effect, realistic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J]. Rural Economy, 2024(10): 24-32.
- [9] 曹菲, 聂颖. 产业融合、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与农民收入增长: 基于海南省县域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J]. 农业经济问题, 2021, 42(8): 28-41.  
CAO F, NIE Y. Industrial convergence, upgrading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structure and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ounty panel data in Hainan Province[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1, 42(8): 28-41.
- [10] 杨秀玉, 乔翠霞. 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空间差异性和收敛性 [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21(1): 67-80.  
YANG X Y, QIAO C X. Spatial difference and convergence of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2, 21(1): 67-80.
- [11] 李晗冰, 王志涛, 李董林. 创新注意力、产业集群与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以“寿光模式”为例 [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24(3): 11-26.  
LI H B, WANG Z T, LI D L. Innovation attention, industrial cluster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forces: a case study of the “Shouguang model” [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24(3): 11-26.
- [12] 杜运周, 尤树洋. 制度逻辑与制度多元性研究前沿探析与未来研究展望 [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3, 35(12): 2-10, 30.  
DU Y Z, YOU S Y. Analysis of the frontier of institutional logic and institutional pluralism research and prospects for further research[J].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13, 35(12): 2-10, 30.
- [13] FAIK I, BARRETT M, OBORN E. Ho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tters in societal change: an affordance-based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J]. MIS Quarterly, 2020, 44(3): 1359-1390.
- [14] 郭强, 刘冬梅. 基于LDA模型的农业农村科技创新政策扩散特征研究 [J]. 中国软科学, 2023(1): 32-39.  
GUO Q, LIU D M. Research on the policy diffusion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science & technology innovation policies based on LDA model[J]. China Soft Science, 2023(1): 32-39.
- [15] 易法敏, 古飞婷. 本地平台商业模式创新、制度逻辑转换与农业数字化转型 [J]. 中国农村观察, 2023(5): 2-23.  
YI F M, GU F T. Local platforms'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 institutional logic change and agricultur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J]. *China Rural Survey*, 2023(5): 2-23.
- [16] OCASIO W, LAAMANEN T, VAARA E. Communication and attention dynamics: an attention-based view of strategic chang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8, 39(1): 155-167.
- [17] 张明, 蓝海林, 陈伟宏. 企业注意力基础观研究综述: 知识基础、理论演化与研究前沿 [J]. *经济管理*, 2018, 40(9): 189-208. ZHANG M, LAN H L, CHEN W H. A literature review of attention-based view of the firm: knowledge base, evolution process, and research front[J]. *Business Management Journal*, 2018, 40(9): 189-208.
- [18] 解学梅, 韩宇航. 本土制造业企业如何在绿色创新中实现“华丽转型”? 基于注意力基础观的多案例研究 [J]. *管理世界*, 2022, 38(3): 76-106. XIE X M, HAN Y H. How can local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chieve luxuriant transformation in green innovation? A multi-case study based on attention-based view[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2, 38(3): 76-106.
- [19] 李青, 钱再见. 中国农业政策变迁的注意力分布及其逻辑阐释 [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4): 108-118, 183. LI Q, QIAN Z J. The allocation of attention towards and the logical ex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policy change in China[J]. *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1(4): 108-118, 183.
- [20] D'ORIO L, CROOK T R, KITCHEN JR D J, et al. The evolution of resource-based inquiry: a review and meta-analytic integration of the strategic resources-actions-performance pathway[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21, 47(6): 1383-1429.
- [21] 卢杨, 宁兆硕, 张利庠. 特色农业区何以推进农业科技进步: 基于农业科技创新治理视角的“寿光模式”纵向案例研究 [J]. *中国农村经济*, 2024(4): 56-78. LU Y, NING Z S, ZHANG L X. How do featured agricultural regions advance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based on Shouguang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governanc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4(4): 56-78.
- [22] SIRMON D G, HITT M A, IRELAND R D, et al. Resource orchestration to create competitive advantag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1, 37(5): 1390-1412.
- [23] SUBRAMANIAN A M, BO W, KAH-HIN C. The role of knowledge base homogeneity in learning from strategic alliances[J]. *Research policy*, 2018, 47(1): 158-168.
- [24] CHADWICK C, SUPER J F, KWON K. Resource orchestration in practice: CEO emphasis on SHRM, commitment-based HR systems, and firm performanc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5, 36(3): 360-376.
- [25] 苏敬勤, 马欢欢, 张帅. 中小制造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演化机理研究 [J]. *科学学研究*, 2020, 38(10): 1888-1898. SU J Q, MA H H, ZHANG S. The research of evolution mechanism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J]. *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 2020, 38(10): 1888-1898.
- [26] 田震, 陈寒松. 制造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机制研究: 基于资源编排理论 [J]. *科研管理*, 2024, 45(1): 31-41. TIAN Z, CHEN H S.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key core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resource orchestration theory[J].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2024, 45(1): 31-41.
- [27] 张青, 吴玉翔. 战略前瞻性、能力形成与企业转型成长: 基于杉杉股份的纵向案例研究 [J]. *经济管理*, 2023, 45(1): 105-124. ZHANG Q, WU Y X. Strategic foresight, capability developing and firm transformational growth: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based on Shanshan shares[J].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Journal*, 2023, 45(1): 105-124.
- [28] 毛基业. 运用结构化的数据分析方法做严谨的质性研究: 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2019)综述 [J]. *管理世界*, 2020, 36(3): 221-227. MAO J Y. Conducting rigorous qualitative research by using a structured data analysis method: review of the forum on case-based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2019)[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0, 36(3): 221-227.
- [29] PRATT M G, SONENSHEIN S, FELDMAN M S. Moving beyond templates: a bricolage approach to conducting trustworthy qualitative research[J].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2022, 25(2): 211-238.
- [30] GIOIA D A, CORLEY K G, HAMILTON A L. Seeking qualitative rigor in inductive research[J].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2013, 16(1): 15-31.

(责任编辑: 孟岑)